

“破”与“立”：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 在当代中国的践行与发展

梁雪玉

(合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自“现代性”这一概念走入大众视野以来,它就始终葆有类似的话语指向,即它是一种多维塑造的概念体系,涵盖启蒙现代性、西方现代性、一元或多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的主要意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视域中,生产体系批判、政治体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分别是现代性建构的首要条件、制度环节和思想准备。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们内在的批判逻辑与建构维度至今仍焕发着生机与活力,并集中反映在中国式现代化潜在的超越性立场与发展性路径之中,如以共同富裕扬弃资本主导的经济现代性,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反思权力主导的政治现代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申自由主导的文化现代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初话语的承袭关系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破”与“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引领与革新作用。

关键词:西方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批判性逻辑;建构性维度;超越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4) 02-0001-07

收稿日期: 2024-02-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22JD71002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守正创新研究。

作者简介:梁雪玉(1995-),女,安徽蚌埠人,合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2.008

“现代性”是现代人对自身所处社会生活状况的一种体验与感知,其中包含着批判性的反思力量 and 建构性的推进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性”一词,但他们经常回应现代性的议题,并将其投射在“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等诸多话语表达之中。从追求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的百年历程来看,我国显然走出了一条既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样板”,亦不同于苏联现代化“模板”的“第三条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这一崭新实践而生成的现代性毫无疑问将会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性。这种新型的现代性是我国在继承、“扬弃”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的前提下,在结合本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厘定与拓展：现代性基本问题的探究

鉴于现代性存在着不同维度的衡量标准和测定原则,所以我们只有在阐明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和具体内涵之后,才能进一步开展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的批判性逻辑和建构性维度的探索工作。

就现代性的哲学内涵而言,它指向一种启蒙现代性。这里“启蒙”一词,一方面来源于黑格尔对“启蒙精神”的思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将启蒙精神视为一种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而是将它视为一种实用精神和实证精神。它们不仅使社会制度趋于异化、社会生活趋于物化,而且使原先的主体性原则变为一种理性压制原则。另一方面,该词来源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它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在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和理性知识不断拓展的背景下人类反倒日益趋近野蛮状态的内在缘由。从这一背景出发,我们能够得出启蒙现代性的内涵,即“启蒙现代性,就是一种以征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科学

知识万能、技术合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历史进步为目标的文明乐观主义”^①。

就现代性的生发之地而言，它指向一种西方现代性。由于后发国家大多走上了“复刻”西方样板和“效仿”西方模式的道路，因而人们常常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现代性。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特质是：其一，统治阶级只有遵循资本逻辑，才能够维持特权地位和占有物质财富；其二，民主和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他们只有将部分权利赋予社会底层民众，才能够完成社会转型、维系社会安定和实现长久统治；其三，西方现代性的出场离不开它对传统宗教的反抗；其四，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是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前提；其五，海外扩张和殖民侵略的功能不只是掠夺资源和占领市场，还包括生产模式、社会体系、文化样态、生活方式的输出。

就现代性的演绎逻辑而言，它指向一元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一元现代性思想源自进化史观。它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现代性就是对这一单线过程的梳理和总结。例如：科尔奈认为现代化模式应当具有普适性，而“中国模式”植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他国家并不能简单地仿效，因此并不存在“中国模式”，只存在“西方模式”。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模仿不过是一种学习过程，各国在将其融入本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联结方式。这就出现了“一元单线论”和“一元多线论”的讨论。除了一元现代性的思考方式之外，学术界还出现了多元现代性的研究路径，即认为各民族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现代性产生了一种重组关系，且这种关系在一开始融入全球化实践和确立现代性目标的时候就已经生成了。

就现代性的探究方式而言，它指向一种反思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各种实践活动及其后果进行预见和审思的一种理论范式。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无疑是一个风险社会。“发达工业社会从自己制造的风险中获得‘滋养’，并以这种方式创造了社会的危险处境和政治可能性，从而让迄今为止的现代化的基础受到拷问。”^②在经历理性宰制、技术僭越、生态威胁之后，风险意识驱使人们对现代性的合理性地位和进步性作用展开诘问。此外，现代性本身也有自反性的需要，由于社会处于迅速变化的环境之中，新旧更替的频率变得越来越快，现代性只有在自我反思和自我确证的过程中才能够剥离纷乱表象，辨明社会内在的特质和发展的桎梏。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本身就包含着复合型的内容，其在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是一种启蒙现代性，在地理环境的限制下是一种西方现代性，在历史背景的参照下是一种一元现代性（一元多线论），以及在现实批判的立场下是一种反思现代性。鉴于此，我们不能孤立、片面、割裂地理解现代性的内涵，而要认清现代性所指代的具体对象和现实场域。

二、批判与建构：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的内核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中，西方现代性存在着资本逻辑的固有缺陷。这种缺陷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劳动剥削、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文化领域的拜物教意识和自然领域的生态破坏。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无法凭借自身力量解决现代性问题。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不再执着于现代社会的自我改造，而是选择去寻求新的革命力量和解放道路。

（一）生产体系批判是现代性建构的首要条件

现代劳动模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典型体现。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它本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丰富化和个性化。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异化不仅剥夺了人的创造能力和生存权利，而且破坏了人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属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分析指出：“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

^①王凤才：《21世纪语境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2页。

^②[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58页。

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① 它的残酷性体现在人们脑力和体力的耗费并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在外界的监管与指挥中进行的。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渐渐将体现个体本质力量的劳动实践视为无意识的本能活动，而将吃饭、喝水、睡觉等动物界的本能行动视为“类本质”的彰显。而分工的系统化和体系化则极大地增强了劳动的强制性效果，将个体变为机器的零部件，重复地做着简单化、碎片化的工作。

现代生产模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内在根源。在工场手工业模式中，劳动者使用的工具还较为简陋，制作工艺的实现仍然需要依靠人脑和人手的协同作用。然而，在机器工厂中，工具开始由机器来操纵，人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只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在此种状况下，工人阶级不断被机器所排挤，成为过剩人口。“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② 其中大多数人都被迫涌向尚未实现机器生产的工业部门，而大量聚集的劳动力资源使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力的交换价格远低于劳动力的价值。机器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仅体现在竞争方面，还表现在压迫方面。在机器出现之前，工人能够通过周期性暴动与短期性罢工来反抗资本家的专制统治。机器出现后，资本家以机器足以替代雇佣工人等说辞和做法来压制工人的不满与愤懑。但这种举动也同样使工人阶级清醒地认识到机器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进而激发起工人阶级反抗的决心和意志。

私有制的扬弃和生产经验的掌握是现代性建构的经济维度。其一，扬弃私人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有产阶级在社会异化中能够感受到人对自然的控制力量，能够借助它来满足自身日益膨胀的欲望和需要。而无产阶级却只能在此种生存状态中看到自身非人的生活处境，他们唯一能够采取的路径就是击溃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消灭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从而解放全社会和无产阶级自身。其二，利用科学技术。“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③ 在现代社会进一步转型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会出现变化，即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基于此，科学服务的对象不再是资本和资本家，而是社会全体成员。其三，转变劳动模式。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管理和分工仍然会得到保留，但这种保留是有条件的，即这种管理和分工的目的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加闲暇时间，从而为社会每个成员的个性发展创造时空条件。

（二）政治体系批判是现代性建构的制度环节

现代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操控社会的统治工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的存在都依赖于对劳动者阶级的奴役。只是在古代国家，这种奴役与血缘关系、宗法制度、等级体系联系在一起；而在现代国家，这种奴役与私人利益、自由竞争、商品经济衔接在一起。这是现代国家的“伪善”之处，它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自然基础，反倒营造出超历史性的永恒假象。此外，二者的相似之处还表现在社会中都存在着人与人互相斗争的状况，甚至现代远比古代还要激烈和严峻。“整个市民社会就是这种由于各自的个性而从此相互隔绝的所有个人之间相互反对的战争，就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④ 看起来，市民社会的成员享有最大限度的独立和最大范围的自由，但是它们实际上是金钱的独立和逐利的自由，是资本逻辑有意塑造的独立和自由。

现代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维系特权的宰制工具。一方面，代议制是统治阶级稳定政权的手段。当资产阶级夺取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他们就“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做自己追求的国家的理想，看做世界的福祉和全人类的目的，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看做对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⑤。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选举制体现的是一种形式民主。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揭示了它的虚假性和伪善性：普选权成为统治阶级随意操弄的政治工具，其民主性、公正性、严肃性的特质变得荡然无存；选举权成为资本家愚弄无产者的政治手段，这种愚弄最集中地表现在它的可随意撤销性。在资产阶级

①④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2页，第316页，第32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7页。

看来,选举权的作用除了反映本阶级内部的分工之外,还旨在平息民愤、缓和矛盾。因而,往往在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时期,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的限制最少、门槛最低。

国家机器的消亡和政治制度的革新是现代性建构的政治维度。一方面,国家机器的消亡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国家的消亡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生产的社会化倾向,即分工的专门化和精细化要求社会各部门形成协作的关系,减少因部门摩擦造成的巨额成本;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要求由国家实现对社会各类资源的统筹管理,减少因自由竞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同时,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消亡之前的过渡状态。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的革新符合革命运动进展的状况。一是正确认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在国家消亡之前,不管是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抵御国内外敌人的侵袭,还是改造国家行政机关,都需要专政力量和权威力量的支撑。二是合理掌握选举制的功能和作用。在革命时期,普选制能够成为测量工人阶级成熟度的标尺。

(三) 意识形态批判是现代性建构的思想准备

宗教信仰是统治阶级安抚民众的精神鸦片。其一,宗教的“去权威化”表现为宗教的日常生活化。在已完成宗教革命和民主政治革命的国家,宗教活动本身摆脱了政治意义和世俗目的,只关注神学意义和理念逻辑。然而,它的日常生活化并不是宗教批判的完成,因为它的保留其实就反映出人们对于现实生存状况的无知、无力和无感,他们需要构造一个幻想世界以摆脱日常生活带来的恐惧与不安。其二,宗教的日常生活化造成利己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基督教“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①。而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的本质的异化形式从神转向金钱,这既是现代性的积极体现,亦是现代性的消极表征。

政治理念是统治阶级欺骗民众的观念陷阱。一是现代理念是资产阶级控制社会的思想工具。现代理念具有抽象化和普遍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有益于资产阶级证明本阶级思想的合规律性,便于其将自身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大众的利益。此外,现代理念具备阶级性和压迫性的特质。资产阶级培养了一批理论家作为自己的发言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②。二是现代理念是资产阶级愚弄民众的思想手段。以自由、平等、理性为代表的现代理念在社会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偏离原意,而成为资产阶级用于掩盖社会矛盾和驯化底层民众的思想工具,如:自由背后的隐性限制和约束被自由贸易和自由买卖所掩盖;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理性的生成及其作用的发挥需要仰赖于地位、身份和财富。

革命实践的推进和阶级意识的重塑是现代性建构的思想维度。一方面,宗教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展开尘世批判。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下,批判绝对不是纯思辨批判,而是借助实践手段和实践策略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作斗争的现实批判。换句话说,只有将思想批判深入到社会革命实践之中,才能给现代社会带来切实的转变。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源于各方面的教育因素。他们没有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利大于弊:一是避免受到宗教观念的荼毒;二是在劳动中认识到社会的腐朽性和资产阶级的贪婪性;三是理论学习始终与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此外,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大脑”和“喉舌”;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发展迫使资产阶级将教育因素赋予无产阶级;而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则使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队伍。

三、超越与发展:中国式现代性标识的彰显

我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一方面,将批判的视野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展到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现代性,极力规避它们造成的现代性危机与困境;另一方面,将建构的维度从经济、政治领域扩展至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之中,使现代性覆盖范围更广、影响力度更强,进而将建设成果惠及到社会全体成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第551页。

员的手中。正是因为我国走上了一条别样的现代化道路,生成了兼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制度、理论体系和文化,而使新型现代性在中国大地上得到细致的谱写和擘画。

(一) 扬弃资本主导的经济现代性

西方现代性的整个生产架构和经济体系都遵循着资本逻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等同于“资本现代性”。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它主要包括以下特征:其一,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是塑造资本现代性的制度基础和实践根基。其二,资本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它对劳动力及其产品的支配和宰制上。其三,资本通过生产活动使劳动者变得商品化、工具化和原子化。其四,资本的统治范围从劳动领域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构想中,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资本主义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在这一阶段应当逐步完成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将社会的各项资源收归国有,由国家进行再分配。然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管是苏联、东欧,还是中国,都不是其本来意义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是积贫积弱的农奴制国家或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缘由是:一方面,资本主义体系完成了由自由主义模式向垄断主义模式、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型;另一方面,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仅把握住喘息的时机,而且掌握好斗争的节点。但不能否认的是,后发社会主义国家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现代性和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步伐,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逐渐正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个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要补足自身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推进现代化事业的主要路径,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我国构建新型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确立新型现代性的最终旨归。而共同富裕的逻辑之所以能够破除资本现代性的魔咒,是因为:首先,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离不开资本,也需要利用资本不断巩固自己的发展基础,但是中国需要的是作为手段的资本而非作为目的的资本,中国需要的是驾驭资本而不是被资本所驾驭。”^①其次,共同富裕的力量体现在脱贫攻坚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国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要打破现代性的陷阱和困境,使社会在新型现代性逻辑的驱动之下焕发生机与活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两翼”,共同富裕则是使“两翼”更加稳固和牢靠的基石。最后,共同富裕的影响范围从经济领域延伸至社会的其他领域。在消解资本、技术与劳动对立关系的过程中,共同富裕的逻辑潜移默化地使技术成为潜能发挥的工具,使社会成为见识增长的平台,使文化成为素养提升的媒介,使自然成为无机的身体。

(二) 反思权力主导的政治现代性

在西方社会,政治现代性有其特定的民主模式和管理经验,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韦伯的官僚制和科层制、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等。而最受资产阶级追捧的莫过于选举制和代议制,其原因在于它们能够掩盖民众和国家的矛盾,并通过它们向国家机关输送利益集团的代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代议制和分权制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武器;选举制是资产阶级谋求统治合法性的工具。而人们只有经过现实实践的试炼与检验,才能真正发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和阶级倾向。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着狭隘性、伪善性、形式化、抽象化的桎梏,所以为了避免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式民主应当具备以下特征:其一,民主内容与民主形式相统一。“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在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②而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体现在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中国坚持民主与专政的有机统一,民主制度保障人民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管理国家事

^①陈玉斌:《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现代性理论范式》,《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第21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59页。

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权利；专政则保留了国家政权的斗争力量以打击那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动摇国家政权、威胁国家与公共安全的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此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有效保证了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摒弃了“一党专政”的弊端和多党“轮流坐庄”的藩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尊重民族风俗和地域习惯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增强各民族、团体、社群、个体的主人翁意识，最大可能地将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可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我国规避了西方式民主的形式化倾向，真正实现了民主内容与民主形式的有机统一。其二，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相结合。我国的民主制度容纳了别样的民主共识，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民主成果进一步深化、细化、优化，涉及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补充和弱势群体民主权利的保障。为了维护企业职工的基本权益，我国广泛推行了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现阶段，中国共有 280.9 万个基层工会组织，覆盖 655.1 万个企事业单位。”^① 它们不仅能够反映职工的基本诉求、协调劳资双方的关系，而且能够成为头脑风暴的聚合点、意见观点的集散地和信息交流的枢纽站。与此同时，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民主权利也被置于社会政策议题的讨论之中。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保障的体制机制、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纲要均单列章节对促进妇女儿童发展的各项举措作出部署。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更新和弱势群体民主权利的保障都是党和政府在直面社会议题和回应群众诉求的过程中补充和完善的民主内容。

（三）重审自由主导的文化现代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思想中，现代性理念始终发挥着思想统治的作用。发展至当代，西方现代性理念的表现形式变得越来越柔性化、隐蔽化、碎片化、日常化和娱乐化。为了守卫主流文化阵地，我国需要使文化认同的对象既能够凸显民族特色、展现历史根基，也能够紧跟时代步伐、符合全球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包含着上述四方面的特质，成为我国重建文化现代性的精神源泉和思想基石。

革命文化以爱国情怀和斗争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的历史视野中，“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越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就越少”^②。当我国以独特的社会面貌迎接文明更替的挑战时，不仅自觉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而且广泛吸纳了本民族爱国情怀和斗争精神的结晶。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阶层分析、斗争经验、社情民意融入革命实践策略之中，形成了关于游击战、持久战、阵地战的人民战争思想，并倡导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激扬革命斗志。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爱国情怀体现在军民同舟共济、军政缪力同心、统一战线群策群力之中；斗争精神则表现在革命战士的英勇无畏、革命策略的精准到位、革命路线的科学研判之中。

优秀传统文化以历史积淀和民族精神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认为，由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因而现代社会无法规避或者逃离传统性，而只能将崭新的实践奠基于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关系之上。中国式现代化同样需要直面二者间的冲突、对立与交融的状况。一方面，人们应当以正确的历史视野来汲取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定位与探寻历史规律。在建党百年之际，社会自上而下广泛开展的“四史”学习教育活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发展过程，正确看待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人们应当凭借文化积淀来维护民族认同、确证文化身份。党的十八大以来，不管是维护文化遗迹、开展文化体验，还是促进文化交流、举办文化盛事，我国始终致力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互鉴。

先进文化以时代使命和创造精神响应中国式现代化。由于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史前”文明，其倡导的文化理念必将随着生产关系的僵化而沦为精神的沉疴和生产力的桎梏，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先进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的民主》，《人民日报》2021 年 12 月 5 日，第 5 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9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70-471 页。

文化实际等同于共产主义模式下的社会理念。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先进文化与前者享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即实践性、超越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具体而言，实践性表现在先进文化生成、检验和发展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超越性反映在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信念，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南。公共性体现在其历史使命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并承担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时代责任。批判性展现在先进文化必须既以自我批判、自我革新、自我发展为基本要点，也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为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具以上特征，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使其得到坚决维护、积极弘扬和主动践行，使人们在理解中内化，在认同下行动。

结 语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成功构建出一种新型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之“新”体现在它以共同富裕扬弃经济现代性、以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政治现代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审文化现代性。正是因为这些先进性成分既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的批判逻辑和建构维度，也反映出中国本土的历史状况、民族风格和文化特质，所以它们才能够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生根发芽，并推动社会朝着更高的阶段迈进。

Breaking and Establishing: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 and Engels Modernity Thou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LIANG Xue-yu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Modernity has occupied similar discourse orientation, which is a collection of concept covering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Western modernity, monistic or pluralistic modernity, reflexive modernity since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come to the attention of public. In the original perspective of Marx and Engels criticism of production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is respectively primary condition, institution link, mental preparation of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internal critical logic and constructive mention of the former so far have been full of refresh and lively, which is reflected in potential transcendence standpoint and development path, such as sublating capital-dominated economic modernity by common prosperity, reviewing power-dominated political modernity by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reflecting freedom-dominated cultural modernity by the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ble to be conducive to understand important leading role and reformation effect of breaking and establishing that analyse inheri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original discourse of Marx and Engels and Chinese discourse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Western modernity; Chinese modernization; critical logic; constructive mention; transcendent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常伟]